



關於早期天師道與 地域文化之關係的幾種學說

● 呂鵬志

在近現代道教研究史上，有關天師道的研究並不算晚，但學者們對它的看法一直多有歧異，似乎很難取得共識。諸如該教派的名稱¹、創始人²、創立時間³、創立地點⁴及其在道教史上的位置⁵等基本問題，迄今尚有不同的說法。關於早期天師道與地域文化之關係的問題，同樣也是意見紛紜。不少學者在探討該教派的淵源、成因或性質時，都注意到了天師道在早期階段（主要指「三張」時期）與某一地域文化之間的關係。不過，由於所據文獻資料不同或理解有別，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衆多異說。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就發表過一篇專論，題為〈天師道與

濱海地域之關係〉⁶。在此文中，陳寅恪先生排比考索了自後漢順帝以來三百餘年間天師道與政治社會有關者，以為悉與東方濱海地域之神仙學說和道術有關。若究其源，天師道本「起自東方」，其創教人張道陵之「道術淵源來自東，而不自西」，其故里「琅邪固天師道發源之地」，「青徐數州，吳會諸郡，實為天師道之傳教區」。陳先生還將「黃巾」與「米賊」並提，認為黃巾軍首領張角與米賊張道陵之道術都傳自海濱，且張角與在濱海區域傳授神書《太平清領書》（又名《太平經》）的于吉、宮崇顯然有關。錢穆先生所撰〈張道陵與黃巾〉⁷一文補充了陳說，認為「張道陵之術，蓋亦本于吉書，太平道與五斗米道

之本出於一源……惟後之言天師道者，則率溯道陵不言于吉耳」。陳、錢所論，實為天師道源出東方說之濫觴，也為後來不少人將五斗米道與太平道聯繫起來進行研究開了先路⁸。

另一種更有影響的說法主張，天師道的產生與古代西南（主要是巴蜀）地域文化，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的信仰有關。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先後有一些歐洲和日本學者（如Leon Wieger、酒井忠夫、Werner Eichhorn等）注意到五斗米道教徒中有許多屬於氐夷的（西藏）土著居民，其宗教實踐（如塗炭齋、房中術等）與氐夷固有的薩滿信仰有關，因而頗疑張道陵所傳之五斗米道來自氐夷。⁹五十年代，中國學者向達和蒙文通先生也先後提出了類似的論點。向達先生根據係出氐羌的李雄（晉）、苻堅（前秦）、姚萇（後秦）以及南詔（唐）都信仰天師道或崇奉天師道之三官而推斷，「張道陵在鶴鳴山學道，所學的道即是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為中心思想，而緣飾以老子之五千文」。雖然向達先生認為對「天師道是氐羌以及南詔大理的固有宗教信仰，還是受的外來影響」不能就下結論，但顯然他對過去那種「認為天師道起源東方，與濱海地區有密切關係」的看法產生了懷疑。¹⁰同樣，蒙文通先生也指出，「天師道蓋原為西南少數民族之宗教，漢末西南民族向北遷徙，賚人、氐人北入漢中及漢水

上游，五斗米道亦於此時入漢中」。蒙又據《晉書》所記「五門叟郝索聚眾為亂」，而「叟」即西南民族之稱，以及「符籙之事始於張道陵，符籙固非中國漢字也」，而判斷「五斗米教原行於西南少數民族」，「疑其為西南民族之宗教而非漢族之宗教」。¹¹向達、蒙文通先生都是在研究其他問題時附帶提出上述論點的，並未對其作全面深入的論證。八十年代以後，卿希泰、王家佑、錢安



張天師，亦稱高明大帝·祖天師，即道教創立者張道陵。



靖、王純五、張橋貴、張澤洪等學者在這一問題上作了更為專門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早期天師道與巴蜀文化及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概略而言，這種關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巴蜀地區黃老道學、巫鬼方術之盛為天師道的誕生創造了良好的文化環境；二，天師道在創立過程中吸收了西南少數民族的不少宗教信仰、巫鬼方術和民俗；三，天師道是通過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固有巫教加以改造而得以形成的。¹² 二戰以後，日本漢學家也發表過這方面的專題論文。¹³ 由於各種古代文獻都記載三張一系天師道起於蜀中，很容易使人想到早期天師道與古代巴蜀及西南少數民族存在必然的聯繫。一般學者之所以都不認可或反對天師道源出東方說（如錢安靖先生的文章就批駁了陳寅恪先生的觀點），而願意接受天師道與西南地域有關的論點，蓋與此不無相關。

天師道源出巴蜀文化及西南少數民族信仰的觀點儘管影響很大，仍然遭到了一些學者的否定和批判。他們在天師道的起源問題上提出新說，且欲推翻流行的見解。1985年，饒宗頤先生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道教與楚俗關係新證——楚文化的新認識〉¹⁴一文，舉出道教成立前若干與道教有關的楚俗，認為道教的成立可以提前，以馬王堆出土資料為代表的楚文化應該是三張鬼道的前驅。他又據此否定舊說，稱：「三張以

鬼設教，說者謂其繼承巴蜀的妖巫鬼道而革新之。今由馬王堆所出新資料，了解楚之巫醫治病、禱祝之詳細情形，得知三張實遠有所受，故論道教之淵源與秦漢間楚俗流行之巫術，其間甚多關聯之處。謂其繼承巴蜀，不若謂其接武荆楚之為愈也。」就天師道與地域文化之關係而言，可以說饒宗頤先生提出了所謂天師道源出南方荆楚的新見。不久，台灣學者丁煌又發表〈漢末三國道教發展與江南地緣關係初探——以張陵天師出生地傳說、江南巫俗及孫吳政權與道教關係為中心之一般考察〉¹⁵，在我們看來可視為補充論證這種新見的論文。其文兼綜東方說與南方說，所論地域範圍由荆楚而擴展於吳越，認為南方素來盛行巫風、方術是漢末三國道教發展的主要原因。在天師道與地域文化之關係方面，此文著力論證了張天師出生於浙江天目山之舊說的合理性，反駁了天師道出於西南氏、羌民族的觀點，並得出新的結論：「張陵道術應得自於東方，實非巴蜀。張陵應非自當地受法而創教，彼早已兼綜諸術，至於巴蜀，不過佈教及創較有形式之組織而已。彼之宗教思想與諸種道術，實早成於彼至漢中巴蜀之先矣。」

還要提到的是，從事道教考古研究的中國學者張勳燎先生近來盡棄他說而別出己見，他在〈東漢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師道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了

天師道最先出現於北方中原地區的特殊見解。其依據主要有三。首先，比較一下東漢和帝以來北方中原墓葬出土的大量「鎮墓」（張勳燎先生稱之為「解注」）材料與現存的衆多天師道經典，會發現兩者的宗教觀念、用語、行文格式、所用方法、鬼神名目都若合符契。其次，作為佐證，他指出鎮墓材料中常出現代表天帝與鬼神打交道的「天帝神師」或「天帝使者」，天師道所稱「天師」其實就是它的簡化稱呼。再有，不少道書亦有關於張陵入蜀以前曾在洛陽奉道的記載。這些證據表明，中原墓葬材料所反映的宗教才是最早的天師道，過去所謂天師道最初是在順帝時由張陵首創於蜀中的說法是靠不住的。張陵在蜀中所創之教，當係由北方中原地區傳入，其名稱也相應地從原來的「天師道」改為「五斗米道」。¹⁶張先生之文雖重在論證天師道的成立可以提前，但也明確指出了早期天師道存在的地域範圍。此文認為，從所有漢墓出土解注器的年代和地域分佈情況來看，天師道最初應是在和帝永元初年或稍前產生於以洛陽和西安為中心的豫、陝之地，以後逐漸向東、西、南幾個方向發展，及於河北西南部、山東西部和四川地區。天師道從北方傳入蜀中並改稱「五斗米道」以後，一方面保存了原有的一些基本內容，同時也有很大的改變。總之，張先生之文揭示了一般人所謂蜀中五斗米道與中原

墓葬文化（天師道）之間的聯繫。與前述三種關於天師道與地域文化之關係的學說比較而言，張勳燎先生所論可稱為北方中原說。

除了東方說、西南說、南方說和北方說，學術界還有其他一些關於早期天師道與地域文化之關係的提法。一是主張天師道與域外文化有關，除K. M. Schipper在「Purity and Strangers: Shifting Boundaries in Medieval Taoism」¹⁷一文中所述之觀點外，Rolf Stein曾論證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與後漢以來中國人眼中的大秦（東羅馬）烏托邦思想有關¹⁸，算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外就是揭示早期天師道與地方基層而不是某一具體地域的關係，如Rolf Stein以「祭酒」和「亭」（相當於「治」和「義舍」）為例，論述了五斗米道的許多內容與地方村社及其官吏的行政和宗教職能有關，蓋因襲後者而來。¹⁹還有一類研究是將天師道的產生與某一個具體的地方及當地文化聯繫起來，如張陵出生或活動之地（江蘇沛國豐縣、浙江天目山、江西龍虎山、四川大邑鶴鳴山、劍閣鶴鳴山、洪雅瓦屋山等）就倍受注意，有不少人著力探尋各地的環境及地方文化在天師道創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因為各人依據的資料和論證方法有別，也引起了關於天師道或整個道教的發源地之爭。

以上諸種學說，孰是孰非，尚難遽



作斷定。它們都認識到了天師道中的地域文化因素，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天師道與地域文化之間究竟是何種關係，愚意以為還須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注釋

¹ 史籍和道書中出現過「五須米道」（或「米巫」、「米道」）、「正一盟威之道」（或「正一道」）、「天師道」等異稱。學術界對該教派最初和後來的名稱及其來歷有不同的看法，參見卿希泰：〈有關五須米道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哲學》第四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頁325-332；曾召南：〈天師道名稱小議〉，《宗教學研究》1984年第6期，頁39-43；丁培仁：〈關於早期正一道的幾個問題〉，《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2期，頁40-46；張澤洪：〈五須米道命名的由來〉，《宗教學研究》1988年第4期，頁12-17；張澤洪：〈天師道三論〉，《天府新論》1993年第6期，頁52-53。

² 史籍和道書大都以張陵為天師道的創始人，現代學者一般也承認所謂「陵傳子衡，衡傳子魯」（《後漢書·劉焉傳》）的傳統說法可信。但也有一些學者懷疑古人所記為偽事。呂思勉《秦漢史》（上海：開明書局，1947年）第二十章指出，這種說法係張陵之孫張魯所依託，「疑（張）魯之法皆襲諸（張）修，特因身殺修，不欲云沿襲其道，乃詭托諸其父祖耳。」（頁830）熊德基《〈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歷史研究》1962年第4期，頁8-25）一文發展了呂說，明確提出張修才是五須米道的領袖。李剛《張修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二十五輯《宗教學研究論集》，1984年，頁60-67）一文分析論證了張修在五須米道創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認為張陵時五須米道尚處於草創時期，張修才

是實際的創始人之一，傳統所說的三張譜系應修正為「張陵-張修-張魯」。

³ 一般都認為天師道始於東漢順帝漢安元年，據道書記載是年張陵托稱太上老君降授其「正一盟威之道」。但也有人否認天師道由張陵首創，提出天師道的成立可以提前，或主張應挪後至漢末張修、張魯時期。前說參見張勳燦：〈東漢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師道的起源〉，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53-266；後說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4-37。

⁴ 一般都認為由張陵創立於蜀中。至於在蜀中何地，則有臨邛鶴鳴山、大邑鶴鳴山、劍閣鶴鳴山、洪雅瓦屋山等不同說法。參見王純五：《天師道二十四治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九章〈鶴鳴神山太上治〉，頁107-128；衛復華：〈中國道教（五須米道）發源地鶴鳴山〉，《宗教學研究》1989年第1-2期，頁6-11；蔡運生：〈道教發源地新考〉，《四川文物》1994年第1期，頁34-36；魏明生：〈張陵創道洪雅瓦屋山的歷史考察〉，載李後強主編：《瓦屋山道教文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308-319。另外，還有所謂天師道不創於蜀中，而創於江西龍虎山等異說。參見郭樹森：〈天師道的創立及其沿革〉，《江西社會科學》1981年第5-6期，頁79-121。

⁵ 一般都將天師道的成立作為道教史的開端，但也有不同意這種看法的。反對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將道教的成立提前，如蕭登福先生主張周秦兩漢時期即有道教，道教並不始於張陵；另一種則是將道教的成立挪後，如小林正美認為劉宋中葉後「道教」才告成立。參見蕭登福：《周秦兩漢早期道教》（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頁1-36；Kobayashi Masayosh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oist

Religion (Tao-chiao) and Its Structure.」 *Acta Asiatica* 68 (1995): 19-36, 或小林正美:〈三洞四輔與「道教」的成立〉, 載《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9年), 頁10-21。

⁶ 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冊(1934年), 後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頁1-40。『《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六期(1941年), 頁915-916。

⁸ 例如大淵忍爾:〈黃巾の亂と五須米道〉, 載《岩波講座世界歷史(5) - 古代(5) -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11)》(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 頁23-52; 宮川尚志:〈張陵と張角〉, 載《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學論集》(廣島: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 1980年), 頁535-549;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箋》第八部分「《想爾注》與《太平經》」(香港:東南書局, 1956年), 又見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頁88-91; 熊德基:〈《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

⁹ 參見 Léon Wiegier, *Taoïsme T. 1: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Hien-hien: Mission Press, 1911), p. 116; 酒井忠夫:〈道教史上より觀たる三張の性格〉, 《支那 教史學》一-四(1937年); Werner Eichhorn, 「Bemerkungen zum Aufstand des Chang Chio und zum Staate des Chang Lu.」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3.2 (1955), p. 319. 法國學者 Rolf Stein 曾對這些學者的觀點作過評論, 參見 Rolf Stein, 「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ïsme* politico-religieux au IIe siècle AP. J.-C.」, *T'oung Pao* 50 (1963): 21-38.

¹⁰ 參見向達:〈南詔史略論 - 南詔史上若干問題的試

探〉, 《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 頁1-29, 又收入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7年), 頁155-194。

¹¹ 參見蒙文通:〈道教史瑣談〉, 原載《中國哲學》第四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0年), 又收入蒙文通:《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 1987年), 頁315-333。

¹² 參見卿希泰:〈有關五須米道的幾個問題〉; 王家祐:〈張陵五須米道與西南民族〉, 收入王家祐:《道教論稿》(成都:巴蜀書社, 1987年), 頁151-166; 錢安靖:〈試論西南少數民族與道教的關係〉, 《貴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頁7-12; 王純五:《天師道二十四治考》上編第四章「五須米道與巴蜀文化」, 頁38-50; 張橋貴:《道教與中國少數民族關係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8年), 第三章「道教的創立及其在少數民族中的傳播」, 頁65-106; 張澤洪:〈五須米道命名的由來〉。

¹³ 例如宮川尚志:〈道教成立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参加〉, 《東海史學》14(1981年); 澤章敏:〈五須米道政權と板楯蠻〉, 《史觀》116(1986年)。

¹⁴ 原載《明報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號, 後收入饒宗頤講演:《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 頁52-68。

¹⁵ 《成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報》第十三號(1987年), 頁155-208。

¹⁶ 關於張陵所創教派名稱, 王家祐與張勳燎先生的看法恰好相反; 王家祐先生認為「五須米道」本是氐羌族系原始宗教, 張陵將其加以改造而創立「天師道」。參見王家祐:〈張陵五須米道與西南民族〉, 頁153-154。

¹⁷ *T'oung Pao* LXXX (1994): 61-63.

¹⁸ Rolf Stein, 「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ïsme politico-religieux au IIe siècle AP. J.-C., *T'oung Pao* 50 (1963): 8-21.

載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主編：《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198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¹⁹ 同上，頁38-78。中國學者寧可也發表過一篇類似的論文，參見寧可：〈五須米道、張魯政權和「社」〉，

年），頁140-165。

編後記

本文列舉了學術界關於「三張」及之前時期天師道與諸地域文化關係的種種說法，是一篇很好的學術綜述文章。對天師道與諸地域文化關係之看法的分歧，實質上反映了學術界對於道教起源問題的爭論。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尚有一種看法可資參考，即相對於陳寅恪「東方說」的聞一多之「西北說」。聞一多撰《神仙考》（見《聞一多全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一冊）認為：道教神仙活動興起於燕齊濱海地域，但齊人「本為西方的羌族」，故道教神仙之說最早應起源於古代西北的羌族之中。其又據《漢書·五行志》言秦始皇為求仙而「鑄金人十二」且使之「皆夷狄服」，得出「可見始皇時還知道真正老牌的仙人是西域籍」的結論。此外，向達等人所主的「氐羌說」實也與「西北說」有關，因治民族史者多以為氐羌最早起源於西北，後方遷徙散居於各地。道教推崇「崑崙崑崙」，《後漢書·劉焉傳》注文有關早期道教領袖尚有漢中張修之說，《三國志·張魯傳》有關張魯政權建立後「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之說，似乎印證了這種看法。又，《晉書·懷帝紀》載永嘉時新豐有「支胡五斗叟郝索聚眾數千人為亂」，而近年考古工作者也發現東晉末遠在高昌（今吐魯番）地區的人就會使用道教符籙之類東西來鎮墓（黃烈：〈略論吐魯番出土的「道教符籙」〉，載《文物》1981年1期）；至唐代，伊州（今哈密）、高昌等地均修建有道觀（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編印：《新疆宗教研究資料》，第八輯，1984年4月）；宋時，西夏黨項羌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甚至專門制訂了二十餘個條款來管理國內眾多道士之入道、注冊、還俗及犯案量刑等事（韓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金元之際，丘處機西行謁見成吉思汗，路過別失八里（今吉木薩爾）時，又曾得當地回鶻貴族率「王官士庶僧道數百」遠迎，其中「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長春真人西游記》）。以上種種現象，似說明「西北說」並非無稽之談；因為以西北地域之廣袤荒漠，民俗之迥異「內地」，而與道教發生關係又如此之早、之深，並不能完全用道教在東漢後方傳入其地來解釋。☉